收入分配、政府支出结构和增长体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1]](#footnote-1)\*

赵 峰 谭 璇

摘要：本文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资本循环模型结合起来，考察了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理论上来看，由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的所需要的时间存在差异，因此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将通过改变整体支出的效率对总需求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政府的社会消费支出和利息支出的增加将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支出效率，减小政府支出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作用，从而加深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保障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保障，而加强分配公平、促进共同富裕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收入分配 政府支出结构 增长体制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15 JEL：E11; E25; H50

一、引言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尤其是继承了古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居于理论体系的重要位置。在马克思（1867，1885）的理论中，资本积累的动态是影响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而积累则来源于资本循环运动中生产和实现的剩余。工资和利润的分配以及利润的使用既影响着剩余生产的水平，也通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条件影响着剩余实现的总体规模。凯恩斯则主要从总需求角度讨论了分配对于增长的重要影响（凯恩斯，1936）。由于收入较低的群体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有效需求，促进商品实现，从而刺激生产扩大。在后来的经济理论发展中，以Kalecki（1971）、Bhaduri和Marglin（1990）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综合并继承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思想，认为调整收入分配将对剩余生产和实现两个因素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工资份额的上升有助于提高有效需求，但同时利润份额的下降将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因此，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倾向工资的调整将带来剩余实现的增加和剩余生产的减少两种效应，综合而言经济增速的变化则取决于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可以发现，收入分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具有较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景的卡莱茨基经济学将二者的关系概况为不同的“增长体制”[[2]](#footnote-2)：若工资份额的上升所引起的剩余实现增加能够弥补其对利润的不利影响，此时经济中可用于积累的总剩余将会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提升，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称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反之，若工资份额上升带动的剩余实现增加难以弥补其对利润的不利影响，则可用于积累的总剩余将会减少，经济增速将随之放缓，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Dutt，2017）。增长体制的研究为理解收入分配结构的动态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同时也为现实中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体制，并据此制定与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供了依据（李帮喜、夏锦清，2019）。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整体或私人部门的运行状况进行的，并没有单独考虑政府部门活动对增长体制的内在影响。通常是在理论或经验层面推导出增长体制之后，将调整政府收支作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适应增长体制的外部政策手段。

然而，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增长是利用社会再生产的剩余，进行生产性积累的结果。财政是由于国家的产生而从社会再生产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并没有也不能改变财政是经济的内在因素这个原有性质，因而财政仍然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特殊环节，其作为政府筹集和使用经济剩余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经济整体剩余的配置（陈共，1982）。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政府为主导、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政府收支活动（高培勇，2015），具有集中和平衡分配资源的功能（吕炜、靳继东，2019），对剩余的生产和实现具有重要影响（陈共，2020）。因此，财政不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筹集收入，主要是对经济剩余的集中和占有过程，是政府支出的基础。而对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更直接地体现在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上。财政支出一方面能够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能够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消费资料，从而对剩余的生产和实现产生影响。因此，财政并非只是调节收入分配以适应增长体制的手段，政府收支活动尤其是政府支出的结构本身，将通过作用于剩余生产和实现而内在地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观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以来，政府支出规模不断上升，而在政府支出的结构上，不同时期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坦齐、舒克内希特，2000）。二战以后，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促进就业，实现了工资份额的相对稳定；同时，还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福利体系，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大幅提升（皮尔逊，2001）。但上世纪70年代末“滞胀”危机的出现，许多国家开始削减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来提高利润，试图以此刺激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公共和私人领域分配结构向利润倾斜的转变，随着“华盛顿共识”的确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近年来，受政府债务规模不断累积的影响，许多国家政府投资支出也在逐渐降低，而债务利息支出则成为了财政的一项重要负担。从经济增长表现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增速与战后“黄金年代”相比明显放缓，这一过程既伴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也伴随着政府支出结构的演变。理论上，在政府支出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政府支出本身对剩余生产和实现的作用将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与此相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支出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形成了有力支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财力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将进一步带来税收增长的放缓。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防范和化解各领域风险、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工作都需要政府支出提供保障。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财政仍旧继续面临“减收、增支、控债”三角问题（郑新业、张力，2017），政府收支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刘昆，2020）。因此，面对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各项制约，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促进政府支出“提质增效”，以实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多重目标就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从社会再生产出发，考察政府支出结构对剩余生产和实现过程的作用，进而分析其对增长体制的影响。在政府支出结构变动的情况下，为理解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方向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关于增长体制相关理论讨论，探讨将政府支出结构纳入分析框架的可能路径；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理论模型，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将如何影响增长体制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其他因素的变化，将对增长体制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如何调整以更好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后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展望。

二、 增长体制的理论基础

（一）增长体制：利润和工资的矛盾与协调

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积累所推动的扩大社会再生产，而积累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客观上的积累来源，主要是生产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利润越多则可能的积累越高。二是主观上的积累意愿，它影响了将利润用于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程度，决定了可能的积累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积累。马克思曾指出，“就总资本的增殖，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3]](#footnote-3)可见，利润既是积累的来源，又是积累所追求的目的，是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因素。

而利润本身是由资本循环过程中产生并得以顺利实现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包括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即：。其中，分别表示资本在循环过程中依次采取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表示分别表示企业使用货币资本在市场中购买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生产阶段将带来价值增殖，因此产出为包含一个增值额（）的商品资本; 表示商品资本经由销售阶段全部实现所获得的货币量，对应补偿在此次循环的购买阶段企业所预付的货币资本量，则为产出中的增值额所对应的货币量。资本只有在持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不断地增殖，因此，这一轮循环所得到的货币将重新被作为货币资本进入下一轮的循环过程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如何影响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也体现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之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经营活动仍然表现为在市场中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以及在市场中销售产品的过程。生产企业的预付资金仍然需要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才能实现增殖；开展生产也必须将预付资金按比例地安排在购买、生产和销售环节，保持这三部分资金在空间上并存，才能保障企业经营活动连续不断地进行。斯大林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4]](#footnote-4)因此，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也完全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运动过程（邓子基、杨炳昆，1996）。

在购买阶段：，生产企业用货币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为生产准备条件。这些商品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这二者在质上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在量上需要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个比例关系为“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5]](#footnote-5)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要达到的这个比例即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一方面受具体的生产技术水平影响，另一方面受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当企业购买到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的货币资本就转化为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力的生产资本,进入到生产阶段：。这里的“”表示资本的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还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到生产领域。在生产阶段，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新的产品，从而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等于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它的使用价值是进行劳动的能力，是价值的源泉。由于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当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补偿其劳动力所必要的时间以上，这部分剩余劳动所对应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因而，新生产出的商品资本在价值上能够超过企业从市场中购买并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总和。因此，有。其中，为企业产出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即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工资则成为了生产企业获得利润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样，劳动者在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被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当这个新增价值额为已知的条件下，工资的相对上升意味着利润将被挤压，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按相反的方向进行（Boddy ＆ Crotty，1975）。此时，可将提升工资对利润的负面作用称为经济增长的成本效应。

企业的生产资本经过生产阶段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商品资本中既包含了补偿企业为开展生产所预付资本的价值，也包含了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些价值仍然表现为商品的形态。只有经过销售阶段：，商品中包含的全部价值得以顺利实现并转化为货币形式，企业垫付的货币才能够重回企业手中，并再次成为货币资本被投入新一轮的循环过程；同时，利润才能够正真被企业所获得，并被用于资本积累或企业主的消费。当实现了的利润被用于追加新的生产资本，再生产的规模则得以扩大。马克思指出“……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经历流通阶段。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6]](#footnote-6)因此，商品售卖的数量，对于企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虽然在个别资本运动中不包含个人消费及与此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但由各个个别资本相互交错形成的社会资本的运动，则必须和应当包含个人消费及与此相适应的商品流通。因此，从社会总资本的循环来看，需求可以抽象为投资和消费两个主要来源。商品的顺利实现有赖于足够的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则是与功能性的收入分配息息相关的。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的贫困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7]](#footnote-7)由于工资和利润在分配新增价值时体现出的对抗性，企业可以通过压低工资来提高利润，这将带来劳动者消费水平的降低。而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降低，将直接影响消费资料部类商品的销售，导致其利润难以实现，阻碍消费资料部类的发展，进而减少消费资料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间接影响生产资料部类的产品实现，使生产资料部类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徐禾，2011）。此时，提高工资则能够有助于消费资料部类的产品实现，进而间接促进生产资料部类的产品实现，整体上帮助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工资提高对利润的正面作用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

整体来看，与个别资本一样，社会总资本也必须通过连续不断的运动，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和扩大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有两重影响效应：一是作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利润的生产；二是作为消费需求的主要来源，影响着利润的实现。利润的生产和实现状况共同决定了现实的利润率水平，影响着企业的积累来源和积累意愿。对应工资的两重身份，其对经济增长产生成本效应和需求效应正反两种作用。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可以通过影响剩余生产和剩余实现，作用于经济增长，增长体制可以呈现出两种情况：当工资份额上升带来的成本效应超过需求效应时，剩余生产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经济表现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而当工资份额提高的需求效应超过成本效应时，剩余实现则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经济表现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

（二）现代增长体制理论的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增长体制理论，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是通过投资函数刻画投资意愿，分析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投资增速的影响途径。Kalecki（1971）提出的包含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的投资函数[[8]](#footnote-8)，为考察工资变化带来的成本效应与需求效应的综合影响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理论中，产品价格的确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平均化的讨论，由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共同组成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率也即成本加成率决定。因此，成本加成率可以体现工资和利润的相对比例。在此基础上，Bhaduri ＆ Marglin（1990）认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是预期利润率而非当期的利润率。在生产技术稳定时，预期利润率可由当期的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决定[[9]](#footnote-9)。收入分配结构倾向资本的变化将引起利润份额上升和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了投资增速的变化。当利润份额上升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超过产能利用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时，经济呈现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反之则表现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

利用投资函数的方法为调整收入分配以适应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将货币、信贷以及国际贸易等问题纳入增长体制的研究中。然而，想要根据这一方法测算一个经济体实际的增长体制，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关于产能利用率的讨论。一是现实中产能利用率的变化不仅体现供求关系的调整，也包含着生产技术的变化，在投资函数中区分这二者的影响仍然存在困难。二是由于企业总是保持一定的过剩产能，那么企业需要调节投资使产能利用率达到何种水平才是合意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争论。

二是直接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把总需求划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考察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这三类需求的影响。Stockhammer ＆ Onara（2004）等提出了一种直接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测算增长体制的经验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提出投资需求则受到利润份额和实际需求水平影响，从而直接将现实的总需求水平纳入分析框架，避免了衡量产能利用率的困难。Onara ＆ Galanis（2012）等学者进一步提出，由于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宏观经济中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判断增长体制更多的是一个经验问题，直接使用现实中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商品价格等经济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等统计方法，获得利润份额变动对各类需求的影响，进而得知一个经济体当下的增长体制。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处于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Hein ＆ Vogel, 2008； Naastepad ＆ Storm, 2007），我国则处于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赵峰等，2018）。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宏观资本循环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支出时间结构来衡量经济中各主体的需求状况，研究影响增长率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关系的因素。基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方法，过于强调需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忽略了利润得以实现之后，只有被用于积累以扩大再生产才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Foley（1982，1986）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构建了一个描述资本循环的基本时间结构和存量流量关系的宏观模型，表达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一模型为将剩余生产和剩余实现结合起来考察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Basu（2014）进一步将企业、企业主以及劳动者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需求引入社会总资本循环的销售阶段，将社会总资本循环中个别资本的销售阶段与其他个别资本的购买阶段以及个人消费联系起来，从而能够在总量上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具体来说，企业的不变资本支出对应了生产资料的需求，企业主未用于积累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工资支出则形成了消费资料需求。在现实中，各市场主体获得一项收入后，通常不会一次性将其全部耗尽，而是在一段自然时间内逐渐花费。因而可以采用不同的支出时间结构来分别刻画企业主和劳动者将其收入逐渐花费掉的过程。由于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更高，因而其支出时间结构相对于企业主更短，工资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当期消费需求。当收入分配结构倾向利润变化时，利润份额的提高能够带来企业投资的增加，而工资份额的减少则会引起当期消费需求的下降，这两个效应综合起来对现实的利润率进而对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并不是单调的，也就是说，增长体制具有工资引导和利润引导两种可能。而具体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再投资比率、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结合资本循环的分析方法与前两种最大的区别在于，将生产、销售和购买活动的自然时间纳入宏观分析，以考察价值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循环速度。通过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过程，我们能够在一个系统框架中讨论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剩余生产和剩余实现的作用，从而分析经济增长可能的变化。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以上几类方法的结果都表明，增长体制的具体形式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

然而，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主体和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其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上述研究的足够重视。一些研究的范围仅限定在私人部门，政府只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众多外生因素的一种存在；而另一些则直接将政府与私人部门的支出合并为消费、投资等需求。政府作为一种非营利性机构，承担着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众多社会职能，其投资和消费的逻辑与私人部门具有显著的区别。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政府部门纳入到增长体制的宏观分析当中。

三、政府支出结构、效率与增长体制：分析框架

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它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10]](#footnote-10)具体来说，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筹集社会再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再通过政府支出将这些剩余用于追加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员的保障。同时，无论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消费都将形成对社会总产品的需求，因此，政府支出发生在社会总资本循环的阶段，政府支出结构对协调宏观资本循环的数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陈共，1982）。本节接下来将政府支出结构引入马克思主义宏观资本循环模型，来考察政府支出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将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资本循环的基本模型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循环的过程中，综合考察了资本停留在购买、生产和销售阶段的时间对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重要影响。以生产过程为例，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入生产环节后，劳动者在生产线上的劳动时间、机器必要的调整和检修时间以及材料运输时间等构成了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需花费的自然时间。由于生产时间的存在，资本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式流入生产阶段，再到以产品形式流出生产阶段，中间将形成一定的生产资本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时间越长，表明生产资本存量越高，企业为组织生产所预付的资本额度将会越大，从而带来利润率的降低。流通过程同样如此，流通时间的延长，表明企业商品资本的库存增大，产品的销售和剩余实现的难度提升，对利润率带来不利影响。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周转期间越短，……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因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来不断重新购买工人，并且推动他的劳动”[[11]](#footnote-11)。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总资本循环包含了剩余不断产生、实现和积累的过程，循环规模的扩大和循环速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马克思的深刻思想，Foley（1982，1986）构建了一个形式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这个框架的改进，我们可以根据社会总资本循环中的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速度的不同作用，来考察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支出效率的差异对扩大再生产的影响。由于宏观资本循环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资本依次经历不同阶段，将转化为新的形式。因此本文在讨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时，采用下标t来表示该项职能形式的资本形成的具体时期。以生产环节为例，有。其中，为用成本价格表示的时期产出总量。由在时期形成的生产资本乘上其在时期转化为产出的比例再按时间顺序加总而得到。代表生产资本在不同时间转化为产品的权重，本文将其称为生产的时间结构。其中，表示生产资本形成的时期，表示生产资本从被购入到转化为产出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因此，，并且有。在现实中，一定时期购入的生产资本并不是在一次生产中全部消耗掉的，而是能够支撑多轮生产，以保障生产得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因而在时期，有比例的继续停留在生产环节形成生产资本存量。因此，可以表示时期投入的生产资本在时期的转化为产出的效率。

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通常根据会计准则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生产成本和库存。以生产成本的核算为例，在先进先出的核算规则下，企业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只有第期购入的原材料完全使用完毕后，才会将第期的原材料价值计入新产品的成本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第期产出的成本价格不再表现为期以前所有时期购入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加总而来，即，而能够对应到期之前确定的某个时期（）购入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表示企业部门购入的生产资料将会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停留在生产阶段的时间（time lag），本文将其称为离散时间形式下的时间结构。Basu（2014）采取离散时间形式的时间结构来刻画这种核算方法下三种资本互相转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并将私人部门的信贷纳入考虑，资本循环过程可表达为：

其中，表示企业部门第期的产品总额，表示销售收入总额， 则表示再投资总额。为第期企业部门获得的生产信贷净额。表示时期的生产时间结构，即时期的产出是由（）时期购入的生产资本转化而来。为企业产品的销售时间结构，表示时期销售出去的产品在时期就已被生产出来成为待售商品。为企业部门的再投资时间结构，用于刻画一定时期的企业部门销售收入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再次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再生产。由于资本在循环过程的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所停留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上标P，R和F来区分资本的生产、销售和再投资时间结构。因此，，，越大，表明资本循环所经历的生产和流通时间越长，相应地，资本在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的循环速度越低，一定量的预付资本在一年内所能获得的利润则越少。

产品价格由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共同组成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率也即成本加成率决定，表示企业部门的平均加成率。需要说明的是，企业部门时期的产出中，既包含了全部生产成本的价值，也包含了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此时的剩余价值还没有被市场所承认，马克思指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资本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12]](#footnote-12)只有经过销售阶段，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才能真正转化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当我们以货币为线索考察宏观资本运动时，能够观察到的循环中的资本规模扩大发生在销售阶段。因此，第期销售收入包含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利润（）两个部分，有。代表企业部门的利润中用于积累的比例，可以衡量企业部门的投资意愿，即再投资率。企业部门的投资意愿通常受到企业预付资本利润率的影响（Basu，2014），而企业预付资本的利润率可由利润比上预付总资本得出。由于企业利润受成本加成率影响，因此，企业的投资意愿即再投资率也受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有。

经济中的总需求包括企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劳动者以及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通过引入市场中各个主体的需求，我们能够将社会总资本循环的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联系起来。并且，由于不同市场主体支出时间结构存在差异，因而他们将收入转化为需求的程度和速度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得以在总量模型中区分生产资本需求和个人消费需求，同时刻画资本和收入的运动，并考察社会再生产的总量平衡。

时期经济的总需求可以表示为：

其中，对应时期企业部门对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需求，则为时期生产资本中可变资本的比例。为时期净新增的消费信贷总额。对应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其工资收入。由于现实中劳动者花费掉其全部工资收入需要一定的自然时间，本文采用来表示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因此有。若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时，有，表明劳动者在时期将花费掉其当期的全部工资收入；若，则表明劳动者在时期购买消费资料的资金部分来自时期以前所获得的工资收入，那么，企业部门在期支付的工资总额则没有全部转化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当企业部门增加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时，其支出的可变资本即工资也将增加，然而，当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时，增加的工资总额无法全部转化为当期的消费资料需求。当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越大，企业的可变资本支出和消费资料需求的差额则越大，这将带来消费资料的需求相对于产出的缺口，进而引起总需求不足。为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的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中的利润。同样，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也并不会一次性花费掉其全部利润收入，本文采用表示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的支出时间结构，有。整体来看，支出时间结构的倒数刻画了不同群体花费其收入的速度，由于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在时期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与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的支出时间结构相比更小。

由于不同类型收入对应的支出时间结构存在差异，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将引起企业部门的不变资本支出、劳动者的消费支出以及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非生产性群体消费支出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改变需求总量。

（二）政府的支出结构

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对资本循环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截至2020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24.17%，较2001年占比上升7%。[[13]](#footnote-13)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学界虽然在近年来倡导减小政府经济活动规模，但其政府支出仍然居高不下。欧盟各国2020年平均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为53.4%，美国和日本2019年的这一数据则分别为38.14%及38.50%。[[14]](#footnote-14)从总量上看，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剩余通过政府部门进行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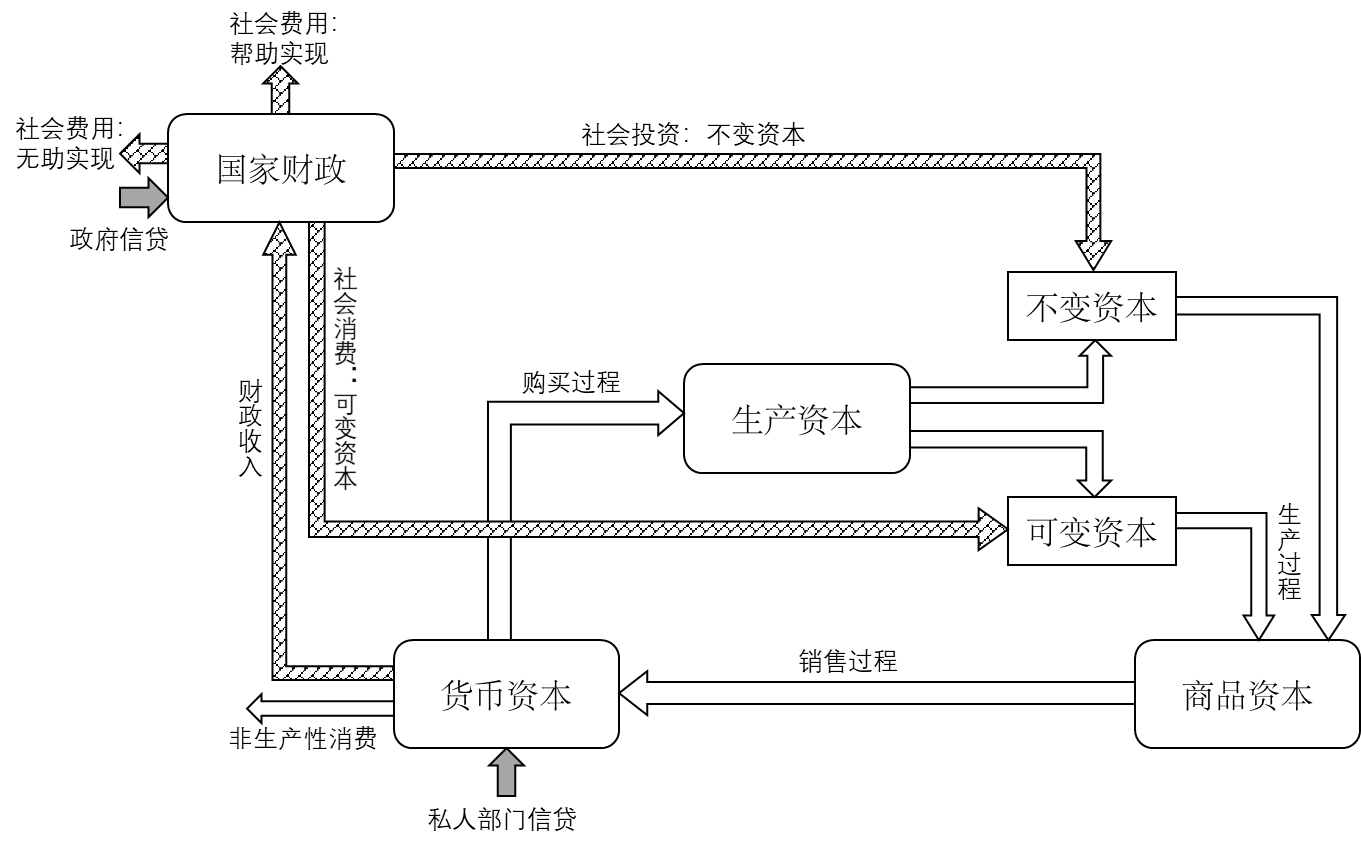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的支出结构与资本循环过程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支出深入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发展的各个领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政府支出的形式和发挥的职能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考察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参考奥康纳（1973）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为基础，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在社会再生产中各个领域和环节的作用，如图1。首先，政府投资建设的道路、桥梁、港口以及水利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满足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运输以及农业灌溉等多种生产活动的需求。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着不变资本的作用，因而相应支出成为了政府的社会投资支出（SIC）。其次，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成员的消费资料越来越难以自给自足。尤其是在医疗、基础教育等领域，政府部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供给作用。由于这部分的政府支出有助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成为政府的社会消费支出（SCV）。此外，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军事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等，难以形成生产资本进入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过程，成为社会费用支出（SEM1）。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失业、养老、抚恤等支出，主要用于维持非劳动人口，本文认为这些支出并没有直接形成可变资本进入社会再生产，更多地是作为社会费用（SEM1）成为商品需求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最后，随着公共债务规模的累积，债务利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逐渐上升，这部分资金流入了金融部门，只有当其从金融部门再度回到实体部门时，才能形成商品需求。本文将政府部门转入金融部门的支出划分为纯粹的社会费用（SEM2）。

与私人部门的支出相同，政府支出也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商品需求。整体来看，各类型政府支出的时间结构也即政府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的效率受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政府的各类支出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直接形成了当期的商品需求，而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则并未立即形成当期的消费资料需求，受到劳动者的支出时间结构影响。由于政府的SIC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社会生产提供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从整体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来看，SIC支出投向了第一部类，因此，SIC支出中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也就是说，SIC支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较小部分用于雇佣劳动者。因而政府SIC支出整体形成需求的时间结构相对较短。需要说明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多年完成，其项目支出将在多年中逐步支付，但这是针对项目预算而言的。而本文讨论的是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即在一年内政府履行各项职能所发生的支出。因此，本文所指的SIC支出，是政府在这一年中实际花费在各个投资项目中的支出总额。与此相对应的，政府SCV支出主要投向生产消费资料如教育、医疗以及文化娱乐等的第二部类，这些行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其资本有机构成与第一部类相比更低，也就是说，政府的SCV中更大的比例用于雇佣劳动者。因此，由于SCV有机构成相对更低，其形成商品需求的时间结构与SIC相比也更长。

其次，政府的支出转化为不同主体的收入，而不同主体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其消费倾向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政府雇佣劳动者的支出形成了其工资收入，而政府的转移支付则形成了一些需要公共救济人群的收入。由于接受政府转移支付的残障人士、退休人士以及贫困人群等收入相对较低，因而其消费意愿更高。此外，SEM1支出除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以外，还包括军事支出、政府部门雇员工资等。已有的研究表明，军事支出是帮助商品实现的重要渠道，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商品需求（Foley, 1978）。整体上，SEM1支出中能够较快形成当期商品需求的部分占比更高，因此，其对应的支出时间结构与SCV的支出时间结构相比更短。

综合而言，SEM1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的效率较SIC慢，但较SCV更快。对于形成利息等支出的SEM2，由于金融部门的货币窖藏等因素，这部分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的速度最低。此外，政府是分配财政资金的主体，但并不是在市场中直接花费各类政府支出的主体。因此财政部门对政府资金的管理和调拨效率，也是一个影响政府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效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加入政府部门的资本循环模型

本节将基本的资本循环模型拓展至包含政府部门，将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引入社会总资本运动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结合本文关于不同类型政府支出效率的分析，构建了一个考察政府支出结构作用于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够考察政府支出结构对增长体制的影响。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以及货币资本间的流量关系可以表示为：

其中，分别表示政府支出中的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这些政府支出成为了生产资本进入到社会总资本循环的生产环节。表示企业和政府支出形成的生产资本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生产转化为商品资本，即生产的时间结构。由于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支出的生产资本具有不同特点[[15]](#footnote-15)，本文采用不同的生产的时间结构进行区分。由于政府的收入来自经济整体的剩余，本文设定政府仅对利润征税，税率为。表示企业部门时期从金融部门获得的生产信贷净额。

需要说明的是，分别表示企业部门购买的生产资本、政府部门支出形成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停留在生产阶段的时间，全社会的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阶段的时间则可以采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本在生产阶段停留的平均时间来刻画，有，其中，（）分别对应生产活动所消耗的各类生产资本在其总量中的占比。表示产成品以商品资本形式停留在销售阶段的时间，则表示货币资本停留在购买阶段的时间。因此，资本在各个阶段停留的时间越短，则循环的速度越快，单个资本在一年内能够参与循环的次数就越多。如果从单次资本循环来看，货币资本需要经历的时间，才能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完成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时间结构，我们可以将处在不同阶段的资本联系起来。例如，在期销售的商品资本事实上是由（）时期投入的生产资本转化未来，即。

结合（6）-（7）式，可以求出经济的总供给为：

时期各市场主体的支出总和即为当期经济的总需求：

表示政府部门的支出总额，其中占比分别为和，有政府部门的支出来源于其筹集到的税收和信贷。政府部门的收入转化为支出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其整体的支出时间结构由和四类支出的时间结构的加权平均数表示，因此政府总支出可以表达为，表示政府部门在期获得的信贷净额。由于表示支付债务利息等流入金融部门的政府支出，因此并不形成对商品的直接需求。当这部分资金采取利息或股息等形式回到公共或私人部门并被用于购买商品，本文采用表示其形成的间接需求，有：。其中，代表进入金融部门后再度被用于购买商品的支出时间结构。

由此，总需求可以改写为：

当经济达到均衡增长时，循环过程中的各项资本流量和存量以均衡增长率增长，并且时间结构、再投资率以及成本加成率等其他参数保持稳定。因此，期处于各循环阶段的资本可以采用初始时期的资本量与均衡增长率来表示，例如，。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均衡增长率将处于循环不同阶段的资本联系起来。同样，以在期销售的商品资本为例，有。将第0期的企业再投资总量标准化为1，则（8）和（10）式可改写为：

由均衡时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可得：

本文根据Basu（2014）的方法，利用隐函数定理讨论均衡增长率的存在性和变化情况。将（13）式改写为隐函数：

其中，参数向量表示其他外生参数。根据隐函数定理，当向量中所有参数都为正时，若满足，则存在唯一的非负值解。可以证明，以上两个条件能够得到满足[[16]](#footnote-16)。

政府支出本身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以通过的符号来判断。根据隐函数定理，，由于已经证明，因此，的符号与一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求出。因此，整体的政府支出时间结构越长，也即政府支出转化为商品需求在时间上的效率越低，经济增长越慢。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由于社会投资（SIC）和社会消费（SEM1）转化为需求的速度更快，提高这两项支出的比重，将有助于提升整体政府支出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成本加成率体现了生产带来的新增价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可以通过成本加成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同样，根据隐函数定理的符号与一致。由：

可以看出，但二者的相对大小并不是确定的，受到外生参数的具体取值的影响。因此，的符号也不确定。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需要结合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综合判断。参考Basu（2014）的方法，令，则有：

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实际的政府支出时间结构的大小来判断宏观经济的增长体制。根据式（20），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政府支出效率门槛值，其数值大小受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增长率、各私人部门的直接和间接支出时间结构、税率、政府支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当时，，提高利润份额可以加快经济增长，即经济处于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而当时，有，表明工资份额的提升能够带动经济增速的提高，经济处于工资拉动型增长体制。综合来看，政府支出的结构变化，既能改变政府支出本身的效率，还将对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支出结构内在地影响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讨论增长体制时，政府绝非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角色，其通过财政支出，能够对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起到调节作用。

政府支出的时间结构，也即政府支出的效率直接影响着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大小。当政府支出效率足够高时，有利于经济中的总需求适应总供给的增长。此时宏观经济处于一种“古典”状态，生产规模的扩大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提高利润份额、扩大积累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将处于利润拉动型增长体制。然而，当政府支出的效率降低，难以维持总需求随着生产同步扩大时，有必要提升其他类型的需求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此时，增加积累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商品积压，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则能够促进消费需求的提升，有助于缓解商品实现困难，进而保障经济增长，此时经济将处于工资拉动型增长体制。由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转化为需求的效率存在差异，因而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能够通过影响政府支出整体时间结构进而对增长体制产生影响。这一过程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四、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与共同富裕

从第三部分理论讨论可知，政府的支出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宏观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也即与其门槛值的相对大小。随着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影响这二者大小的因素也将发生变化。由于各类政府支出转化为产品需求所花费的时间存在差异，因此，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将引起整体政府支出效率的改变。具体来说，支出效率较高的SIC和SEM1占比上升，则将带来缩小，而增加SCV和SEM2支出则会延长。当经济中其他宏观因素不变，也即不变时，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将改变整体有效需求的大小，进而对增长体制产生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SEM2占比提升还将引起的变化。根据式（20），有，表明上升将导致减小。因此，SEM2占比提升将导致政府部门的整体支出时间结构大于的可能性提高，经济更容易呈现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

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支出作为政府履行各种职能的保障，其结构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目标（刘昆，2021）。奥康纳（1973）提出，国家的财政支出目标可以划分为保障资本积累和维持政府合法性两个层面。因此，政府既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为资本积累提供一般的生产条件和具备基本技能的劳动力，也需要为缓解私人部门资本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引发的经济和生态危机安排预算。两种目标的冲突和协调决定了政府支出结构的基本状态及其演变。其次，社会经济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也对政府支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工业化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对生产扩大至关重要，而在基础设施处于饱和的后工业化阶段，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提高利润率的可能收效甚微。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皮尔逊，2001）。婴儿潮时期需要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而老龄化社会则对医疗和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政府的实物性支出，均投入了社会再生产的具体领域。政府支出投入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相应的使用价值，因此，该领域的技术水平越高，则获得特定规模使用价值所花费的政府支出越少。相应的，技术进步较慢的服务行业，政府需要花费的支出比例将会逐渐提高（皮尔逊，2001）。最后，政府支出结构的一个重要约束来自收入层面。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费、经营国有企业以及债务等多种方式筹集收入。但税收和收费的提高，将减少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的资金来源；而债务收入过高，则将加重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

二战以后，逐渐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此过程中，军事支出一度成为美国政府支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37年，美国军事支出仅占GDP的1.1%，到1960年增长至8.8%[[17]](#footnote-17)。并且，随着战后政府职能的扩张等因素，上世纪六十年代，SEM1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达50%以上。这一时期，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SIC平均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13%。而1974年石油危机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增速减缓，带来政府收入增长下滑，而由于政府支出仍在增长，政府赤字逐渐扩大。随着债务压力的上涨，到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限制并减小政府经济活动、保持政府预算平衡，得到了广泛认同。

图2 1960年以来美国各项政府支出占总政府支出比例

注：①1970-2019年数据根据OECD数据库整理所得：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r=200781#；1960-1969年数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按职能划分的政府支出：一种新的表述》（*Government Spending by Function: A New Presentation*）整理所得，https://apps.bea.gov/scb/pdf/national/niparel/2000/0600gf.pdf。

②美国政府支出结构说明：本文根据OECD数据库中按政府职能分类的政府支出数据，将其按照SIC、SCV、SEM1和SEM2的性质进行分类整合。具体对应如下：SIC：经济事务支出；SCV：住房与社区建设支出，卫生支出，文化娱乐与宗教支出，教育支出；SEM1：公共服务支出、军事支出、公共秩序支出、环境支出、社会保障支出；SEM2：公共债务利息支出。

图3 196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和劳动份额的变化情况

注：①GDP增长率变化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数据整理所得：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19& 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316#reqid=19&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316。

②劳动份额变化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数据整理所得：1960-1999年数据：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 cfm?reqid=19&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316#reqid=19&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316；2000-2019年数据：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19&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316#reqid=19&step=3&isuri=1&1919=survey&1903=316。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见图2），美国政府支出结构呈现出SCV占比持续上涨，SIC和SEM1占比不断下降，SEM2占比先升后降的状态。在理论上，美国政府支出结构中支出效率较低的SCV和SEM1占比的上升，直接导致了整体政府支出效率的降低，也即增大，进而导致整体政府需求的减少；同时，SEM2占比提高还将导致衡量政府支出效率是否足够的标准下降，进一步加强政府支出效率降低对有效需求的不利影响。当超过时，政府支出效率降低带来的总需求缺口需要依靠促进其他消费需求来弥补，增长体制将表现为工资拉动型。结合1960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结构来看（见图3），以工资薪金占GDP比例为代表的劳动份额一直处于负增长，由1960-1969年平均50.13%下降至2010-2019年平均42.7%。尤其是1980-1989年这十年中，劳动份额下降比例接近5%。劳动份额的持续降低表明劳资收入分化的不断加剧，以劳动者需求为主的消费需求也表现得增长乏力。

美国政府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共同加深了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带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将导致财富在一端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端的积累。生产带来的新增价值在劳资分配中的不均衡内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并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利润率的下降逐渐深化。而劳动者收入降低引发的劳动力再生产困难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医疗、文化、教育和住房等服务降低劳动者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消费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然而，政府部门承担的SCV支出上升，反过来将引起政府支出效率降低，不利于总需求扩大。并且，随着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存在公共债务积累的问题，债务相关支出的增加在降低政府支出效率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朝向工资拉动型增长体制发展。整体来看，这种旨在协调私人资本积累矛盾的制度安排，不但难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反而还将加深商品实现的困难。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以及公共债务持续上升的问题（施特雷克，2016），美国的情况正是这三种趋势相互交织、互相强化的典型表现。美国政府支出中SCV和SEM2的提高，非但没能减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反而由于降低了政府支出转化为有效需求的效率而进一步推动了以上三个趋势的相互强化过程，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给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以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图4 2009-2020年中国各项政府支出占总政府支出比例变化

注：①2009-2019年数据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10-2020）整理所得；2021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整理所得，http://https--data--stats--gov--cn.proxy.www.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中国政府支出结构说明：2007年国家统计局采取新版财政支出分类指标。本文将按功能性质划分的财政支出对应SIC、SCV、SEM1和SEM2的性质进行分类整合，具体对应如下：SIC：科学技术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支出、城乡社区支出；SCV：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SEM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量有污渍储备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其他支出；SEM2：金融支出、债务付息支出。

③我国国家统计局按功能性质划分的政府支出分类与OECD的分类在口径上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根据各项政府支出在社会再生产中所处的环节将其划分为SIC、SCV、SEM1及SEM2后，为我们观察和比较中美两国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及这种差异下两国的政府支出效率的区别及趋势上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在我国，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提高，政府支出结构也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根据图4，2020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出中，SEM1、SCV、SIC和SEM2占比分别为39.76%、27.24%、28.97%和4.03%。其中，SEM1和SIC是我国政府支出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近年来，随着国家开展简政放权和控制“三公消费”等行政管理改革，一般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减少引起了SEM1占比逐渐下降。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带动政府的城乡社区建设、教育和医疗支出稳步提升，推高了SCV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与美国政府支出结构相比，我国政府SIC支出占比明显更高，在总财政支出中占比相对稳定。2016年以来，利息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明显提高。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我国政府支出效率整体较高，但由于SCV和SEM2占比提高的趋势，政府支出的效率将缓慢下降。

图5 我国GDP增长率与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图6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情况

注：①中央财政债务余额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https--data--stats--gov--cn.proxy.www.stats.gov.cn/ easyquery.htm?cn=C01；2014-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2020）；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来自财政部网站：http://yss.mof.gov.cn/zhuantilanmu/dfzgl/sjtj/202101/t20210125\_3649040.htm。

②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并开始公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统计数据。

结合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债务情况来看（见图5、图6），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平均经济增速较前一个时期略有下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尚未超过50%，虽然与欧洲、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低，但中央和地方公共债务水平仍然表现出增长趋势；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情况则从2009-2010年开始得到逐步改善，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渐回升。大致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呈相反方向，也就是说，我国近年来大体上处于利润引导性增长体制，这一初步结果也与相关研究相类似（赵峰等，2018）。政府支出结构中支出效率较高的SIC和SEM1比重较大，有力地支撑起了经济中的有效需求。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深以及提倡“三胎”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的一系列教育、医疗、住宅、养老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等支出仍将继续上升，因此，社会消费占政府支出比重还将持续增长。在政府支出增长的同时，我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持续推进一定程度上将减缓税收收入的增长，进而引起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上升。而政府债务增加引起的利息支出上涨将进一步削弱政府支出的效率。理论上，SCV和SEM2的增长将降低政府支出的效率，使得增长体制转向工资引导型。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带来总需求的相对减少，进而拖累整体经济的循环速度，不利于经济增长。

面对政府支出结构演变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及时配合相应的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与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相协调，才能够弥补SCV和SEM2的增长引起的政府支出效率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当政府支出结构变化导致政府支出效率降低时，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推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调整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中的消费需求，加快宏观经济循环，弥补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从而保障经济增长。此外，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既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也要维护和促进生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提高，政府通过社会投资所提供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能够为更广泛的生产过程提供一般的、公共的生产条件，促进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社会投资作为一种效率更高的政府支出，提高社会投资能够在整体上加快政府支出效率，从而提升宏观资本循环速度。

五 结论

一直以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沿着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讨论了工资和利润分配在资本循环运动的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的对抗性和协调性，说明工资不仅是生产的成本，还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对利润率产生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单调的，增长体制可以呈现出工资引导和利润引导两种状态，需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来综合考量。

由于财政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因此，政府收支也是影响增长体制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政府支出结构将通过对剩余生产和实现的作用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带有政府部门的宏观资本循环模型，发现政府的社会投资支出占比越高，创造的一般生产条件越完善，则越有利于资本积累。在这种条件下，提高利润以增加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支出效率相对较低的社会消费和利息支出的增长，则将降低整体政府支出对剩余实现的作用，需要提高劳动份额刺激消费需求，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既反映了客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关需求，也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份额持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恶化使得政府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而教育、医疗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成本相对上升、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进一步促进了政府社会消费支出的增加。政府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拖累了政府支出的整体效率，进而降低了政府支出提振总需求的能力。这反过来又需要提高劳动份额来弥补社会消费增加对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但是如前所述，带来政府社会费用支出提升的，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引起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本身。可以说，美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不仅通过自身，也通过其对政府支出的影响侵蚀着美国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使其不断立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这给我国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消费支出，政府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一定程度上对其整体支出效率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政府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方面，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保障社会投资在政府支出中的重要地位，这既能够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必要的社会生产条件，也有助于在整体上提升宏观资本循环的效率。另一方面，加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促进共同富裕，这并不仅仅是发展的目的和结果，同时也是提升消费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是根本，而分配公平则是保障。习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协调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相互促进过程中，一是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二是要将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坚持循序渐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三是要构建和完善现代财税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筹集和拨付效率，提升财政资金周转速度，促进财政支出发挥更大效力。

参考文献：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保罗·皮尔逊，2001：《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中译本。

陈共，1982：《论以再生产为前提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财政研究》第3期。

陈共，2020：《财政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子基、杨炳昆，1996：《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

高培勇，2015：《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管理世界》第12期。

黄彪、赵晓楷，2021：《需求体制存在吗？——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批判》，《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李帮喜、夏锦清，2019：《新卡莱茨基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第11期。

刘昆，2020：《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求是》第4期。

刘昆，《党领导财政工作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学习时报》2021年11月8日。

刘文超、路剑，2016：《从新剑桥增长模型到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当代转向》，《经济学动态》第1期。

吕炜、靳继东，2019：《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70 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管理世界》第9期。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秦蒙，2019：《对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批判性评述——基于对罗桑和巴杜里-马格林模型的考察》，《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维托·坦齐、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00：《20世纪的公共支出：全球视野》，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译本。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2016：《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译本。

徐禾，2011：《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詹姆斯·奥康纳，1973：《国家的财政危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

赵峰、陈宝林、章永辉、季雷，2018：《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0期。

赵峰、田佳禾、段雨晨，2021：《对新卡莱茨基增长体制理论的反思：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视角》，《教学与研究》第9期。

郑新业、张力，2017：《财政“不可能三角”之可能》，《探索与争鸣》第9期。

Basu, D. (2014), “Comparative Growth Dynamics in a Discrete-time Marxian Circuit of Capital Mode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6(2): 162-183.

Bhaduri, A. ＆ S. Marglin (1990),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of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375–393.

Boddy R. ＆ J. Crotty (1975),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1): 1-19.

Dutt, A. (2017), “Heterodox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Partial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00(0): 1–32.

Foley, D. (1978), “State Expenditur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 221-238.

——(1982), “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8: 300–319.

——(1986),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in, E. ＆ L. Vogel (2008),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Empirical Results for Six OECD Countr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479-511.

Kalecki, M.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astepad, C. ＆ S. Storm (2006), “OECD Demand Regimes (1960-2000)”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9(2): 211-246.

Onara, Ö. ＆ G. Galanis (2012), “Is Aggregate Demand Wage-led or Profit-led? National and Global Effect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tockhammer, E. ＆ Ö. Onara (2004), “Accum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 to a Kaleckian Macro-Model”,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5(4): 421-447.

附录：

证明隐函数存在唯一的非负解：

由（A1）-（A3）可得：

由于取值均在[0,1]中，因而有。

此外，由于：

故有：

因此，随着的增大单调递减，根据，可知隐函数存在唯一的非负解。

Income distributi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the regimes of economic growth: a Marxian perspective

ZHAO Feng TAN X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mbines Marx's total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 theory with the capital cycl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mechanism. Theoretically, because the time requir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transform into commodity demand is different,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will affect the total demand by changing the efficiency of overall expenditure. With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oci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interest expenditure will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duce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effective demand, and deepen the impact of labor demand o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adjus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ensuring and improving work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Fac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basis and guarante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strengthening distribution equ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also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Regimes of Economic Growth; Common Prosperity

1. \* 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zhaofeng\_economics@163.com；谭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 tanxuanruc@163.com。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号：20ZDA01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学研究”（批准号：21XNLG01），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footnote-ref-1)
2. 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均采用了“增长体制”这一概念来概括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包括“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wage-led regime）和“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profit-led regime）（赵峰等，2021；黄彪、赵晓楷，2021；秦蒙，2019；刘文超、路剑；2016）。本文也延续这些文献的传统，采用“增长体制”这一表述。 [↑](#footnote-ref-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footnote-ref-3)
4.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1页。 [↑](#footnote-ref-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footnote-ref-5)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footnote-ref-6)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48页。 [↑](#footnote-ref-7)
8. 卡莱斯基投资函数的一般形式：，其中，代表投资增长率，表示利润率，表示产能利用率。并且有。 [↑](#footnote-ref-8)
9. Bhaduri-Marglin投资函数的一般形式：，其中，为利润份额，有。 [↑](#footnote-ref-9)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footnote-ref-10)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7-348页。 [↑](#footnote-ref-11)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页。 [↑](#footnote-ref-12)
13.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计算：http://https--data--stats--gov--cn.proxy.www.stats.gov.cn/ easyquery.htm?cn=C01。 [↑](#footnote-ref-13)
14. 数据来源：根据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r=200781#。 [↑](#footnote-ref-14)
15. 政府支出形成的不变资本以道路、桥梁、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为主，投资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同时，政府支出形成的可变资本则是通过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消费资料参与劳动力再生产。 [↑](#footnote-ref-15)
16. 证明过程请见附录。 [↑](#footnote-ref-16)
17. 数据来源：坦齐、舒克内希特，2000：《20世纪的公共支出：全球视野》，第35-36页。 [↑](#footnote-ref-17)